

民国时期中华博物学会活动述论

梁 从国

提要：民国时期的中华博物学会，其前身渊源有二：中华博物研究会和博物调查会。本文即以两会合并前后的时段为界，大致勾勒中华博物学会的全貌活动；并以此为基础，论述该学会的若干历史成绩，探讨其兴衰原由。

关键词：中华博物学会；中华博物研究会；博物调查会；《博物学杂志》

中华博物学会¹是民国上半叶较为活跃的科学社团。目前学界对此着墨不多，仅就笔者所见，该领域研究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是薛攀皋先生的《中国最早的三种与生物学有关的博物学杂志》一文²。此外，他还曾给该学会作词条注释，写道，“中华博物学会的前身中华博物研究会成立于1914年2月4日，会部在上海，1922年改为中华博物学会。……会长袁希涛，副会长吴家煦、陈宝泉。研究会的工作设想包括联络全国学界，出版杂志，制作标本，刊行书籍，筹办博物藏书楼(图书馆)、标本陈列所、植物园、动物园、博物院、中华博物学校及传习所。该会是民间组织，全部经费来源于会员交纳的人会费、常年会费和捐款，由于会员不多，经费短缺，上述计划除了出版《博物学杂志》外，大多落空”。³姚远、王睿、姚树峰等编著《中国近代科技期刊源流：1792-1949》一书⁴中“《博物学杂志》”的期刊条目下简单介绍了该学会的情况。总体而言，上述零星的文章或词条主要围绕该学会创办的《博物学杂志》而展开论说，其中间或涉及该学会在统一植物学名词所做的有益探索，但对其社团组织活动的整体勾勒尚显不足。譬如，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博物学杂志》发行到第1卷第3期之后，到1928年终刊，中间有明显的休刊再复刊的过程。在此期间，中华博物学会做了些什么？颇为遗憾的是，当下的研究对此揭示相当薄弱。而这，又会影响到对该学会的历史地位的评价。再则，前述薛先生一文中还存在一些史实错误。⁵

¹ “中华博物学会”的英文名 Natural Science Association of China，来自于薛攀皋的说法，参见钱迎倩、王亚辉主编，祁国荣副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生物学》一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30页）。笔者未能查询到该名的原始出处，暂且采用之。另外，需说明的是，该会创办的《博物学杂志》，其英文名 Journal of Natural Science 从第一卷第四期开始，即进行标注。

² 载《中国科技史料》，1992年，第13卷第1期。

³ 钱迎倩、王亚辉主编；祁国荣副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生物学》，第630页。

⁴ 参见该书上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85-291页。

⁵ 薛文中说，《博物学杂志》是由“中华博物研究会（有时称为中华博物学会）创办的”，又说“中华博物研究会1914年在南京市江苏省教育学会举行成立大会”。这段叙述有两个错误：一是中华博物学会是由中华博物研究会和博物调查会两个学会合并而成，不存在“中华博物研究会”和“中华博物学

笔者依据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结合本文主旨,试图去重新拼接一个较为清晰完整的中华博物学会,以就教于方家。

一、合并前的中华博物研究会和博物调查会

实际上,中华博物学会源头有二:一为中华博物研究会(以下简称“博研会”)、一为博物调查会(以下简称“博查会”)。⁶1919年8月,这两个学会合并后,更名为中华博物学会(除引文外,下文凡指涉该会,一般均简称“中博会”)。下面先就合并前这两个学会情况略述一二。

博研会发源于1913年春,发起人为吴家煦、凌昌焕。其时成员不足20人,至次年已有成员47人,故于这年2月4日,借用江苏省教育会(总部在上海)的场地举行成立大会。⁷发起人感慨中华大地物产丰富,然博物学研究乏人,又多依附日本学术,因而“睹品类之纷纭,恫实学之不振,亦尝搜奇集珍,揣形比色,冀以一洗从前弃陋之旧习,顾以土宇辽阔,物类蕃滋,不有同志,智识终孤,不有机关,友生难集,用敢狂乎将伯,创举是会,上以续李吴未竟之绪,下以开中华学会之端,明知多识之学,有乖时尚。而一物不知,儒者所耻,况乎其影响所被,或可为振兴实业之资,宁止促进科学而已哉?!”⁸学会宗旨为“发明全国之博物区系,增进学识,改良教材,发达实业”。⁹在合并之前,博研会的主要活动如下:

1、创办《博物学杂志》,在合并前共出刊3期,先后由上海文明书局及中华书局承印,印行后社会反响不错,称其“风行全国,远及海外,西国博物家亦贻书称本其价值”。¹⁰该会并向其他学会

会”同时并称;二是中华博物研究会成立的地点在上海的江苏省教育会,而非“南京市江苏省教育学会”。又,近年来罗桂环研究员撰著的《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345页)及其主编的《中国生物学史:近现代卷》(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445页)两书,均引用了薛先生此文,造成了类似的错误。需要指出的是,薛氏一文中并无叙述合并成立中华博物学会的时间,但给中华博物学会作词条注释时,他言“1922年改为中华博物学会”。大概吴国盛教授也采信了这一说法(详见氏撰《自然史还是博物学?》,载《读书》,2016年第1期)。实际上,改称“中华博物学会”的时间是1919年8月。而上述罗桂环的两书在叙述中华博物学会成立的时间点上,标注为1918年8月,也是错误的。不过,奇怪的是《中国生物学史:近现代卷》在他处又标明了正确的时间,即1919年(详见该书第156页)。

⁶ 该会有称“中华博物调查会”,或“北京博物调查会”。笔者兹据其时教育部备案的名称“博物调查会”,以示统一(参见《教部立案之学术团体》,载《申报》,1925年5月26日,第11版)。

⁷ 参见《记事》及黄炎培《博物学杂志祝辞》一文,均载《博物学杂志》,1914年10月第1卷第1期;该会会所也暂设于江苏省教育会,见《上教育部立案禀》,载《博物学杂志》,1916年第1卷第3期。不过,另一则报道则言博研会发起人为叶心安、陈纶、薛凤昌、蔡寅等人(参见《各省纪闻·中华博物研究会之第一幕》,载《教育周报(杭州)》,1914年第50期)。这四人均为博研会成立时的成员,应是发起人之一,但该则报道未提及主要发起人吴家煦,个中原因,尚不知晓。

⁸ 《中华博物研究会宣言》,载《博物学杂志》,1914年10月第1卷第1期。

⁹ 《简章》,载《博物学杂志》,1914年10月第1卷第1期。

¹⁰ 《本馆定报价目·博物学杂志》,载《申报》,1916年3月31日,第1版。第1、2期发行时间分别为1914年10月、1915年12月。第3期发行时间笔者判断为4月至7月间,理由为:第1卷第3期

社团、出版机构赠送杂志，如江苏省教育会、《申报》馆等，¹¹也接受或个人、或组织机构的赠书，有关生物学知识的书刊也所在多有。¹²该会还发行博物丛书，印有《中国植物志》、《江苏植物志略》及《动物学通论》等书。¹³

2、建立学会领导机构，并在多地设立支部，拓展会员。该会成立之时，若按组织架构，应有“会长一人，动、植、生、矿四部主任各一人”，但其时这五个职位均暂缺，仅选举出杂志总编辑吴家煦。¹⁴该会成立之后，大约主要精力放在了发行杂志上，对于学会的领导成员均未措意。¹⁵资料显示，该会于1916年7月30日在上海开常年大会，选举出会长吴家煦、副会长章鸿钊、动物部主任邹秉文、植物部主任彭世芳、生理部主任薛德焯、矿物部主任王烈君、会计员凌昌焕君等人。¹⁶而此前的1916年2月12日，博研会获得教育部立案。其时《申报》便称述该会，“中华博物研究会成立迄今已阅三载，得主持者之毅力进行，会务日见起色，学界渐知博物之重要，不复如前此之漠视矣。今年春该会在教育部禀准立案，又得黎大总统之奖许，当代诸巨公之赞助，会员日众。湖南湖北两省已着手组织支部”。¹⁷在合并之前，博研会发展的支部则有湖南、湖北、江苏南京及吴县等支部。¹⁸其中像湖北支部便是博研会在上海接待武昌高师博物部的学生时奠定的，而其时受宴请的广东籍武昌高师博物部毕业生也有意组织“粤支部”。¹⁹1917年8月12日又在苏州开常年大会，将各科主任改为两人，除吴家煦连任外，副会长为王朝阳，植物科主任则为彭世芳、吴元涤，动物科主任则为薛德焯、邹秉文。次日还发展东吴大学生物学系创办人祁天锡为会员，托其寄送标本至美国确定标本学名，而博研会方面则提供标本的汉名。²⁰

虽标明出版日期为“民国五年三月”，但该期杂志中黎元洪的题词落款为“中华民国五年四月”，又据《中华博物研究会在沪开会预志》（载《申报》，1916年7月28日，第10版）中有言“今年春该会在教育部禀准立案，又得黎大总统之奖许”，故笔者下此断语。

¹¹ 《省教育会第六日讲演大会纪》，载《申报》，1914年11月29日，第10版；《介绍新著》，载《申报》1916年3月26日，第11版。

¹² 例如在美国留学的邹秉文，赠送“美国芝加哥大学植物杂志一份、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月刊一份”；美国洛特图书馆赠送薛台纲要杂志一份，以及美国纽约爱拨书局赠送鸟类志一份等。参见《赠书汇志》，载《博物学杂志》，1915年12月第1卷第2期。

¹³ 吴家煦：《挽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科学教育》（中），载南京中国教育建设协会编：《教育建设》，1942年2月第3卷第5期。

¹⁴ 《简章》、《记事》，均载《博物学杂志》，1914年10月第1卷第1期。

¹⁵ 1915年在该会通告中，就表示“决非仅仅以发行杂志为止。翌年暑假中当开大会，凡属本会会员，请预先研究本会进行办法，届时发表，互相讨论，以期实施”。参见《本会通告》，载《博物学杂志》，1915年12月第1卷第2期。

¹⁶ 《博物研究会开会纪事》，载《申报》，1916年8月1日，第11版。

¹⁷ 《中华博物研究会在沪开会预志》，载《申报》，1916年7月28日，第10版。

¹⁸ 《中华博物研究会在苏开会记》，载《申报》，1917年8月16日，第11版。

¹⁹ 《博物研究会欢宴旅行团》，载《申报》，1917年6月6日，第11版。

²⁰ 《中华博物研究会在苏开会记》，载《申报》，1917年8月16日，第11版。祁天锡，美国人，于

截至 1916 年春夏间,博研会吸收会员共计 78 人,其中江苏籍会员 53 人,占全部会员的 67%;属于教育系统(指任职或留学)计 35 人,几乎占学会人数的一半。较为著名的有:任职南昌高师教师、后任武昌高师动物学科的薛德焄;时任北京高师博物部教师陈映璜、彭世芳、吴续祖等 3 人;像副会长王朝阳,时任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其时尚为学生或留学生、日后在生物学领域占得一席之地的会员则有秉志、过探先、邹秉文、胡经甫、钱崇澍、钟心煊等人。²¹可以看出,最初成立的三年间,博研会苏籍色彩相当浓厚。然而,三年之后,据吴家熙的回忆,合并之前的博研会共发展会员 216 人,有苏、鄂、湘、粤、鲁、赣、北平等地支部。²²博研会的社会影响力于此可见一斑。

3、知识普及与交流活动。在博研会常年大会中,有进行生物学知识演讲活动的事项,如 1916 年 7 月 30 日在上海的常会大会中,就有“钱崇澍君演说钼錵对于水绵之影响,又邹应蕙君讲演中国植物之分布,又薛德焄君讲演庐山旅行采集之状况,又彭世君讲演博物教授之目的及改良之方法。四君所讲或学理深邃,或调查明确,或供采集之参考,或示教授之准,使在座听者获益不鲜”。²³博研会也于 1917 年 8 月 11 日至 8 月 13 日在江苏吴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举办博物展览会,称“鉴于吾国博物之不发达,大为实业之阻害,力图提倡,而提倡之法以展览会为最收效果”;展品范围以及要求为“凡出品须由出品者附以说明,如名称。如为标本,须兼有学名及汉名产地(此项只限于标本)、效用(亦限于标本)、出品之所属(如某学校、某团体或某某等)等。其范围及种类如左:(甲)范围,学校(如高等师范、寻常师范、中学、甲种实业)、团体(如本会、农会、科学社)、个人;(乙)种类,标本、模型、图表(照相片附)、书籍(中、东、西籍)、著作(除成卷者外,凡篇章文字如游记、采集记、调查报告、研究之心得等亦入之)。”²⁴《申报》曾对此次展览活动有详细报道,言“会场设于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占教室六间,由右侧登楼,有进行标贴指导参观人。……综计陈列品之种类,大别为标本、模型、图表、书籍、著作。而标本最多,有腊叶

1912 年在教会大学——东吴大学(校址在苏州)建立起“中国大学第一个生物系”(参见王国平:《东吴大学简史》,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58 页;李昂、罗桂环:《祁天锡对中国生物学事业的贡献》,载《中华科技史学会学刊》,2009 年第 13 期)。

²¹ 综合《博物学杂志》第 1 卷第 1-3 期《会员录》、《会员续录》、《会员续录》及第 3 期《会员纳费一览表》统计而得。秉志(1886-1965),中国近代动物学的开拓者和主要奠基人;过探先(1886-1929),中国现代农业教育和棉花育种事业的开拓者;邹秉文(1893-1985),中国植物病理学教育的先驱;胡经甫(1896-1972),昆虫学的奠基人之一;钱崇澍(1883-1965),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钟心煊(1892-1961),在植物分类学等领域颇有成绩。

²² 吴家熙:《挽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科学教育》(下),载南京中国教育建设协会编:《教育建设》,1942 年 3 月第 3 卷第 6 期。但吴氏的记述似乎有误,像“粤支部”,应是在合并之后所成立,例如《申报》所载《博物学会欢迎广东参观团》(载 1921 年 5 月 15 日,第 10 版),便有谈到“组织中华博物学会粤支部”一事;而像北京支部,则是他将合并后的北京中华博物学会本部与之混淆。

²³ 《博物研究会开会纪事》,载《申报》,1916 年 8 月 1 日,第 11 版。

²⁴ 《博物研究会征集出品》,载《申报》,1917 年 7 月 3 日,第 11 版。

液浸、干制、剥制、截片等液浸品；有医校之真正人体各内脏。此外如注射品、剥制品多吾华特产。其它模型、图表、书籍、著作等非特于学术上足资研究，而于实业上尤关重要。至若陈列之次序，先学校，次个人，终以该会。所占面积学校占十之七，该会占十之三，个人出品俱系会员。故概括于该会区域内，出品之学校有省立第一及第二师范、省立水产、省立蚕业、省立第一及第二、农业省立第二、及第五中学，公立专门医学、县立吴江中学校。该会则有湘支部、鄂支部，及会员王鸣冈、薛德焄、吴元淦、毛文吟、杜就田、凌昌焕、吴家煦诸人之出品。……计三日男女宾络绎不绝，大半为学界中人。往往铅笔、纸簿就出品记录，历半日不去，展览会之有益学问于此可见”。²⁵

博研会还参与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如 1917 年 8 月 12 年的常年大会决定“推举代表参加医学名词审查会细菌组，审查细菌名词，即推定邹秉文、庞敦敏、于矿三君”；并预备“划一博物名词，议先从术语入手，公推吴元淦为植物名词起草员，薛德焄君为动物名词起草员”等。²⁶此外，该会还曾替外国人制作甲鱼标本，获酬劳“十金”。²⁷值得注意的是，博研会也设想成为一个“交换种子之机关”，而登报向全国学校发出倡议“征求植物种子”。²⁸

正因为博研会有上述成绩和宏愿，该会获得江苏省公署常年补助费 500 元，又曾获得教育部一次补助费 500 元，“以示鼓励”²⁹；其湖南支部据说得到当地富人陈宜诚万金支助办植物园，而博研会讨论的结果，则认为以此金额先建博物院为宜。³⁰不过这项金额较大的资助似乎并没有成行，但从侧面也反映出博研会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

博查会成立于 1916 年 1 月，地址在北京“宣武门外大街路西北京学界俱乐部内”，由时任教育部次长的袁希涛所组织推动。³¹除袁氏担任会长外，成员多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职员，如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时任副会长）、博物部教师彭世芳（后任教育部视学）及陈映璜等人，总计人数在 40 人上下。³²博查会设学会之目的在于“联合海内同志，各就本地出产，详为调查，分途采

²⁵ 《博物展览会纪事》，载《申报》，1917 年 8 月 18 日，第 7 版；此次展览会所列标本，也可参看宋森：《中华博物展览会记略》，载《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1917 年（下）。

²⁶ 《中华博物研究会在苏开会记》，载《申报》，1917 年 8 月 16 日，第 11 版。

²⁷ 《西人托觅著甲鱼》，载《博物学杂志》，1915 年 12 月第 1 卷第 2 期。

²⁸ 《中华博物研究会征求植物种子致全国学校书》，载《新闻报》，1917 年 10 月 20 日，第 10 版。

²⁹ 《博物研究会请到省款》，载《申报》，1917 年 10 月 16 日，第 11 版；《中华博物研究会请准部款》，载《申报》，1917 年 12 月 6 日，第 10 版。

³⁰ 《中华博物研究会在苏开会记》，载《申报》，1917 年 8 月 16 日，第 11 版。

³¹ 《批博物调查会该会与上海博物研究会合并改定名称及所订会章应准备案（第六百三十七号，八年十月十四日）》，载《教育公报》，1919 年第 6 卷第 12 期，59-61 页；《中央纪闻·博物调查会章程》，载《教育周报（杭州）》，1916 年第 122 期。

³² 《要闻一·北京通信·中华博物学会成立》，载《申报》，1919 年 8 月 27 日，第 6 版；吴家煦：《挽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科学教育》（上），载南京中国教育建设协会编：《教育建设》，1942 年 1 月第 3 卷第 4 期。

集，别其种类，定其名称”，“以为实业之先导，而图教育之进步”³³；所办事项则有“调查各地之动植矿物种类”、“研究采集及保存方法”、“交换各地方之特殊产物”等三项。³⁴吴家煦称该会为“半官式的学术机关”，大概不无道理。³⁵

博查会在教育部立案之初，即得到后者 7000 元资助，又因主事者袁希涛的因素，获得部令，有言“通咨各省略该会拟调查本国所产动植矿物，以宏科学而广用途，洵于教育实业关系切要，应请令行高等师范暨师范中学、甲种农业等校，凡教授博物学科各教员，可于每年各学期内，就地方所产依法采集制成标本，邮寄本部。其学生修学旅行时及暑假期内，各教员尤宜豫为指导，令其注意采集，汇送到部。由部属托该会，详加检定。如有成绩优异者，应由该会照章呈请，酌给褒奖，相应检同采集法。咨请查照，分别令飭各学校，遵照办理可也”。³⁶

正因为博查会与教育部这层亲密的关系，它借助国家教育行政主管机关的平台，又得教育部第 420 号训令，预定在 1919 年 1 月 24 日至 2 月 5 日在北京该会会所举办博物展览会，称“吾国土地辽远，南北之物产种类纷繁，非多方采取，不足以扩见闻，非互相比较不足以资进步，尚望同志诸君，不憚烦劳，热心收集，届时邮寄本会，以补同人学术之缺憾而扬我国物产之光华幸甚”。博物展览会以“比较各校博物成迹，调查全国物产为宗旨”，对展出物品之要求、范围及种类规定多与前述博研会相同，而且在“团体”参加栏特意增加了“博物研究会”。标本审定员大多由北京高师教师“陈映璜、吴续祖、彭世芳、王烈、张勇朴诸夫子主持之”。所不同者，在于评奖环节，“呈请教育部分别给与奖凭或奖章”。³⁷在征集展品期间，有上海松江县“李县长转飭县农会长吴步蟾遵令办理，闻吴奉令后，已将农产标本着手采取矣”；也有扬州第八中学“嘱令生徒平时于课后采集各种植物调制标本，兹已完全制就”，并在送交北京之前，先行在校内展览，“计菊科、茄科、唇形科、十字花科、石竹科、禾本科、茜草科等共二百余种”，吸引了许多外校师生前来参观。³⁸尽管如此，博物展览会因“各校所送标本尚属寥寥，特议定会期改为本年（即 1919 年，笔者注）八月十五日起至九月十日仍在北京举行”。³⁹《申报》对此展览会也有报道，言“其中出品虽不过多，然骤观之，亦颇五光十色，目为之炫，出品机关共计一百二十处。就中以农商部中央农事试验场暨北京高等师范两处为最多，论及个人出品则以高师教员彭世芳所制植物标本最出色。……动植矿三部分皆有”。

³³ 《采集动植矿物之动机》，载《申报》，1917 年 2 月 8 日，第 6 版。

³⁴ 《中央纪闻·博物调查会章程》，载《教育周报（杭州）》，1916 年第 122 期。

³⁵ 吴家煦：《挽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科学教育》（上）。

³⁶ 《采集动植矿物之动机》，载《申报》，1917 年 2 月 8 日，第 6 版。

³⁷ 《北京博物展览会缘起简章》，载《申报》，1918 年 3 月 3 日，第 10 版；龚启镛《中华植物学进步史》，载《博物杂志》，1919 年 9 月第 1 期。

³⁸ 《地方通信·松江·展览会征求标本》，载《申报》，1918 年 11 月 8 日，第 7 版；《扬州·第八中学校展览博物成绩》，载《申报》，1918 年 12 月 28 日，第 7 版。

³⁹ 《京华短简》，载《申报》，1919 年 1 月 9 日，第 6 版。

⁴⁰ 若从曾任中博会植物主任彭世芳的记述来看，这次展览会共计展出标本 11132 件⁴¹，数量颇为可观。不过，这篇报道对于此次展览会，批评也较多。其认为场地太窄，于展品分类方法“多不能加意讲求”，进而建议说，“博物展览会既纯以研究学术为主旨，则陈列各物似宜依照学术的分类。如动物则始自微生物而终至脊椎，植物则隐花显花（显花又须分其大类）各分其部。此外则择其切于人生实用者可另立应用动物、应用植物二部。壁间则多挂图表，物侧则多附说明书，如此庶于该会所谓增学识、启发实业之宗旨相合”。⁴² 若干年后，吴家煦也对此次展览颇有微词，说博查会尽管开了这次展览会，印了一册很厚的《展览会标本总目录》，“但是会务不很发达，人才太少，没有负责进行的人”。⁴³ 这或许从侧面反映出，草创之初的博查会，开展相关学会活动是如何的青涩和经验不足。

二、合并后的中华博物学会

博研会与博查会两会会员中本有交叉，例如北京高师的彭世芳，便是这两会的成员，而像博查会会长袁希涛，在博研会成立之初，即为该会的“赞成员”。⁴⁴ 因此，早在 1918 年 11、12 月之交，两会就协商合并事宜，并定会名为“中华博物学会”，又于次年 4 月登报宣告“正式合并改称”，约定“于本年（指 1919 年，笔者注）八月十四日即阴历七月十九日在北京开成立大会，并举行博物展览会”。⁴⁵ 不过，最终博物展览会时间定在该年 8 月 15 日，而成立大会则是第二天，即 8 月 16 日。⁴⁶

是日，两会“议定章程十条，定名为中华博物学会。其宗旨在考察全国之动植矿物、增进学识、改良教材、启发实业。北京设本部，上海设分事务所，各地方设支部。会长、副会长以下分设主任。入会会员之资格极宽。凡本部、支部均区划为动植矿三科，由各会员分科担任。其进行事项：（一）调查全国物产；（二）编印杂志书籍；（三）举行展览会及讲演会；（四）制造标本；（五）筹备博物图书馆；（六）筹办动物园、植物园及博物标本陈列馆”；并选举袁希涛为会长，吴家煦、陈宝泉两

⁴⁰ 《要闻一·北京通信·中华博物学会成立》，载《申报》，1919 年 8 月 27 日，第 6 版。

⁴¹ 彭世芳：《中华博物学会叙略》，载中华博物学会编：《中华博物学会第一次展览会报告书》，北京：共和印刷局，1922 年。而吴家煦多年后回忆，称言“合动植矿统计之，得五万余种”，恐系有误（吴家煦：《中国博物学变迁史》，载南京国立编译馆编：《文化汇刊》，1943 年第 3 卷第 1 期）。

⁴² 《要闻一·北京通信·中华博物学会成立》，载《申报》，1919 年 8 月 27 日，第 6 版。

⁴³ 吴家煦：《挽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科学教育》（中），载南京中国教育建设协会编：《教育建设》，1942 年 2 月第 3 卷第 5 期。

⁴⁴ “赞成员”意指赞成博研会学会“宗旨及捐助经费者，一律推为本会名誉赞成员”。参见《中华博物研究会简章》及《赞成员录》，载《博物学杂志》，1914 年 10 月第 1 卷第 1 期。

⁴⁵ 《中华博物研究会 北京博物调查会宣告合并改称》，载《时报》，1919 年 4 月 6 日，第 1 版；《批博物调查会该会与上海博物研究会合并改定名称及所订会章应准备案（第六百三十七号，八年十月十四日）》，载《教育公报》，1919 年第 6 卷第 12 期。

⁴⁶ 《中华博物学会开成立会 展览会通告》，载《时报》，1919 年 8 月 10 日，第 2 版；《中华博物学会在京大会记》，载《时报》，1919 年 8 月 24 日，第 6 版。

人为副会长。⁴⁷中博会历次常年大会情况参见下表：

中华博物学会常年大会情况表（1919-1926 年）⁴⁸

年份	开幕日期	地点	会长	副会长	动物主任	植物主任	矿物主任	备注
1919	8 月 16 日	北京顺治门大街江西会馆对面（《申报》言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袁希涛	吴家煦、陈宝泉	陈映璜、薛德焄	彭世芳、黄以仁	翁文灏、章鸿钊	各领导骨干选举产生
1920								停开
1921	8 月 1 日	上海陆家浜中华职业学校	袁希涛	吴家煦、陈宝泉	陈映璜、薛德焄	彭世芳、黄以仁	翁文灏、章鸿钊	各领导骨干选举产生
1922	7 月 11 日	上海	袁希涛	吴家煦、陈映璜	薛德焄、秉志	黄以仁、彭世芳	翁文灏、章鸿钊	同上
1923	8 月 8 日	上海西区方斜路江苏省教育会	袁希涛	吴家煦、彭世芳	薛德焄、秉志	黄以仁、吴元涤	翁文灏、章鸿钊	同上
1924	8 月 15 日	无锡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袁希涛	吴家煦、钱崇澍	薛德焄	朱凤美	翁文灏	同上
1925	7 月 11 日	杭州新市场西悦来酒馆	袁希涛	吴家煦、钱崇澍				因江浙战事，改为非正式会议，未选举，续任。
1926	7 月 9 日	上海四马路	袁希涛	吴家煦、				原因不

⁴⁷ 《中华博物学会在京大会记》，载《时报》，1919 年 8 月 24 日，第 6 版。

⁴⁸ 汇总如下材料而得：《中华博物学会在京大会记》，载《时报》，1919 年 8 月 24 日，第 6 版；《中华博物学会开成立会 展览会通告》，载《时报》，1919 年 7 月 25 日，第 3 版。；《要闻一·北京通信·中华博物学会成立》，载《申报》，1919 年 8 月 27 日，第 6 版；《中华博物学会改期开会》，载《申报》，1920 年 8 月 10 日，第 10 版；《中华博物学会大会续纪》，载《申报》，1921 年 8 月 7 日，第 14 版；《中华博物学会开会纪》，载《时报》，1922 年 7 月 19 日，第 10 版；《中华博物学会大会记》，载《申报》，1923 年 8 月 9 日，第 14 版；《国内要闻二·各省教育界噪声·中华博物学会年会之第二日》，载《申报》，1924 年 8 月 17 日，第 11 版；《中华博物学会在杭商榷会务》，载《申报》，1925 年 7 月 12 日，第 9 版；《本埠科学名词审查会本年审查结束》，载《申报》，1926 年 7 月 11 日，第 11 版。

	日	路倚虹楼		钱崇澍				明,为非正式会议,未选举,续任。
--	---	------	--	-----	--	--	--	------------------

用吴家煦的话说,合并后成立的中博会优势明显,“会中经济比较充裕,原来是研究会多事业而缺经费,调查会多经费而少事业”,⁴⁹意即经费与事业均能大有斩获,齐头并进;中博会的成员也达到 284 人。⁵⁰

中博会成立后,主要进行五个方面的活动:

1、继续发行《博物学杂志》。该杂志自 1916 年发行第 1 卷第 3 期后,“因印刷及经济上种种关系,致半途中辍”,至 1921 年 8 月吴家煦辞去总编辑一职,由吴元恊继任。⁵¹在其担任编辑主任后,杂志共发行了五期,⁵²并改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承印。⁵³这样的格局,至该杂志终刊时一直如此。此外,该会于 1922 至 1926 年间印行自然科学类书籍。⁵⁴在此期间,中博会还资助由武昌高师博物学会主办的《博物学会杂志》,以中博会鄂支部名义与后者合办,共计三期;武昌高师博物学会由此“每年得中华博物学会杂志津贴费 150 元,以年出四期为限”。⁵⁵

2、采集并制造标本。吴家煦曾记述说,合并后的中博会,有成立“博物标本制作所”的决议。⁵⁶据笔者所掌握的零星资料,大概这个制作所运作了一段时间。1924 年,陶行知曾作中华教育改进社会务报告,记述中博会将部分标本寄存于该社在北京的教育陈列所,有言“该会(指中博会)存在所中之标本如下:(一)剥制标本,98 件;(二)浸制动物标本,171 件;(三)昆虫标本,62 匣约 250 余件;(四)植物腊叶标本,4569 件;(五)植物标本木材种籽类,268 件;(六)浸制植物标本,20 件;(七)矿物标本,1225 件;(八)中外博物书籍,80 余部”。⁵⁷可知中博会之标本采集制作有一

⁴⁹ 吴家煦:《挽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科学教育》(中)。

⁵⁰ 吴家煦:《挽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科学教育》(下)。

⁵¹ 《吴冰心启事》,载《博物学杂志》,1922 年第 1 卷第 4 期。

⁵² 这五期发行时间分别为:1922 年 8 月(第 1 卷第 4 期)、1923 年 3 月(第 2 卷第 1 期)、1927 年 10 月(第 2 卷第 2 期)、1927 年 12 月(第 2 卷第 3 期)和 1928 年 10 月(第 2 卷第 4 期)。上述前两期编辑队伍有五人,即吴家煦、薛德焯、彭世芳、朱凤英、黄以仁,后三期均无。

⁵³ 《博物学杂志继续出版》,载《申报》,1922 年 8 月 22 日,第 3 版。但部分书以为该杂志一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例如白寿彝总主编、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 11 卷·近代前编(1840-1919)》(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865 页)便持这样的观点。

⁵⁴ 《北京出版史志》编辑部编:《北京出版史志》(第 8 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年,第 181 页。

⁵⁵ 《大事记(续)》,载《博物学会杂志》(武昌),1923 年 3 月第 4 卷第 4 期。另注:这 3 期分别为第 4 卷 3 期、第 4 卷 4 期及第 5 卷 1 期。

⁵⁶ 吴家煦:《挽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科学教育》(中)。

⁵⁷ 《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社务报告》,载胡晓风、金成林主编:《陶行知全集第 12 卷》(补遗二卷),

定成绩。中博会还拓展采集标本的范围,试图组织临海生物研究会。有关对临海生物研究的提议,早在合并前的 1917 年 8 月 12 日博研会常年大会上,便有薛德焄所提举行临海实习会及讲演会议的议案。⁵⁸中博会成立后,在 1923 年 8 月召开的常年大会上,便通过次年暑期组织临海生物研究会案,并公推薛德焄、秉志、吴元淦、费鸿年为筹备员,“会同商订一切办法”。⁵⁹值得一提的是,这年秉志及费鸿年都刊文倡导设立临海生物研究所。⁶⁰次年 8 月在无锡召开的常年大会上,又议决“本会今后宜注重临海生物研究事业案”。⁶¹其时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杂志,对此也有报道,称“该会(指中博会)原定明年(即 1925 年)举行临海生物采集,曾推定秉农山、薛良叔二君主其事。此次讨论会务,多数会员为永久计,议决先从设立临海生物研究所入手,并推定秉农山、薛良叔、钱崇澍三君拟具計畫书,袁袁观澜、吴和士两会长设法进行云”。⁶²1926 年 7 月,中博会借出席科学名词审查会之机,宴请己会会员,再议决“临海生物研究所事”,决定从 1927 年 9 月先举行临海生物学讲习会,由秉志、薛德焄、钱崇澍、吴元淦、朱凤美为导师,“尽九月之一个月期间从事采制研究。凡会员及中等以上学校生物教员愿入会偕往者,先期与会接洽地点,决定厦门及烟台两处。在此两处中,于出发之三个月前择定一处通告与会人员。一面由会在厦门、烟台两处布置会员居留,所托秉农山、吴子修两君分头与厦门大学及烟台某校接洽,以后永远作为中华博物学会临海生物研究所之借定场所。至章程等由正副会长与导师商定后,印发会员及各校”。⁶³按吴家熙事后的说法,“筹设临海生物采集实验所,假集美师范学校余屋为所址,委托秉志综司其事”。⁶⁴不过真正的临海生物研究机构,大概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才实现。⁶⁵

3、组织博物展览会。就笔者目力所及,中博会仅举办过一届博物展览会。⁶⁶此次博物展览会即是中博会成立初(1919 年 8、9 月间)原由博查会组织的展览会,已如前述。1922 年 9 月由北京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92 页。

⁵⁸ 《中华博物研究会在苏开会记》,载《申报》,1917 年 8 月 16 日,第 11 版。

⁵⁹ 《中华博物学会大会记》,载《申报》,1923 年 8 月 9 日,第 14 版。

⁶⁰ 参见秉志:《倡议海滨生物实验所说》,载《科学》,1923 年 3 月第 8 卷第 3 期;费鸿年:《临海生物学实验所之重要及欧洲著名实验所概况》,载《东方杂志》,1923 年第 20 卷第 10 号。

⁶¹ 《国内要闻二·各省教育界噪声·无锡中华博物学会年会之第一日》,载《申报》,1924 年 8 月 16 日,第 12 版。

⁶² 《琐闻·中华博物学会之年会》,载《科学》,1925 年 1 月第 9 卷第 8 期。另注:秉农山即秉志、薛良叔即薛德焄、吴和士即吴家熙。

⁶³ 《科学名词审查会本年审查结束》,载《申报》,1926 年 7 月 11 日,第 11 版。

⁶⁴ 吴家熙:《中国博物学变迁史》,载南京国立编译馆编:《文化汇刊》,1943 年第 3 卷第 1 期。

⁶⁵ 姜玉平:《民国生物学高等教育与研究的体制化》,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3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47 页。

⁶⁶ 中博会在 1922 年的常年大会上,“议决民国十三年举行”第二届博物展览会,而在次年的常年大会上,未知是否报道有误,言“举行第三届博物展览会时期及地点案,议决时局未定,暂缓进行”(详见《中华博物学会开会纪》,载《时报》,1922 年 7 月 19 日,第 10 版;《中华博物学会大会记》,载《申报》,1923 年 8 月 9 日,第 14 版)。此后中博会有关会务中,没有再提起博物展览会事宜。

共和印刷局出版《中华博物学会第一次展览会报告书》，介绍了此次展览会的参展单位和个人，并列出各标本的名称、学名、类属、出品人、产地等信息。⁶⁷值得一提的是，中博会的吴县支部曾议定于1923年2月19日、20日两天在该县青年会教室举办通俗展览会，“任人游览”、“以灌输一班人之博物智识”。⁶⁸

4、参与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尤其在植物学术语方面有所贡献。前述1917年8月博研会确定吴元涤为植物名词起草员。其后黄以仁、彭世芳、吴续祖、张宗绪等人，“各有专著汇同增删修正，凡普通植物学术语及分类科目名称，大致具备”。⁶⁹1921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科学名词审查会第七次大会，确定植物名词的起草由中博会担任。⁷⁰同年8月3日至5日在中博会的常年大会上，审查代表有彭世芳（以教育部代表出席）、吴家煦、黄以仁、吴续祖、彭树滋、黄以增、吴元涤等数人，“除术语之外，植物科目亦连带审查，对于日本式之名称颇多改正，主席推定吴子修、彭型百、黄子彦三君加以整理分期登载《博物学杂志》，俾早日发布征求意见，以四期登毕，即刊单行本，再付科学名词审查会征求意见，然后送教育部审定公布，继此即起物名草案，预备明年审查”。⁷¹该审查稿后刊登在《博物学杂志》第1卷第4期及第2卷第1期上。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科学名词审查会，中博会代表参加植物组的有吴元涤、黄以仁（吴家煦以教育部兼江苏省教育会代表出席），参加动物组的则有薛德焄、杜就田。《申报》报载当日审查情况，言“植物组之术语及科目名称。本系中华博物学会去年开审查会之定本。为征集意见起见。送会讨论为最后之修正。故讨论较易，术语有少数修正外，增补不少，全部告竣，惟科目名称因关系较巨，仍须征集意见俟下届开会确定。主席为吴和士君、书记为吴子修君、由吴君整理后交执行部付印。动物组因原草案不甚适用，依据薛良叔君《近世动物学》临时起草。计门纲目名词及无脊椎动物之术语已审查完毕；有脊椎动物术语及进化、发生、遗传等名词，俟下届审查。主席为薛良叔君、书记为杜就田君，由薛君整理审查稿后交执行部印行”。⁷²此后1923年至1926年间，中博会均与会科学名词审查会的每年大会。中博会的顾绍衣、吴家煦还被选任过该会的执行部代表。⁷³

5、注重中小学自然科学教育。1912年9月，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规定“理科”为高等小学校科目之一。这门课程中，就有关于动植物知识内容，称“宜授习见之植物、动物、矿物及自

⁶⁷ 笔者推测，前述吴家煦称会后印了很厚的一本《展览会标本总目录》，大概即指《中华博物学会第一次展览会报告书》。

⁶⁸ 《地方通信·苏州·博物支会将开展览会》，载《申报》，1923年2月11日，第11版。

⁶⁹ 《植物学名词第一次审查本说明》，载《博物学杂志》，1922年第1卷第4期。

⁷⁰ 《科学名词审查会开会续纪》，载《申报》，1921年7月13日，第11版。

⁷¹ 《博物会审查植物名词》，载《申报》1921年8月10日，第14版。

⁷² 《科学名词审查会纪要》，载《申报》，1922年7月14日，第15版。

⁷³ 《科学名词审查会开会续纪》，载《申报》，1921年7月13日，第11版；《科学名词审查会纪要》，载《申报》，1922年7月14日，第15版；《名词审查会之执行部常会》，载《申报》，1926年7月22日，第7版。

然现象,使知重要之名称、形状、效用、发育及其相互关系,与对于人生之关系”。⁷⁴但理科教育并不被重视。有鉴于此,其时中博会会长袁希涛呈案教育部,称“谨按格物致知,古有明训。欧战以还,各国学校尤重实验。关于自然科学之教授,日益精密。潮流所趋,我国未可独后。现在各省师范、中学等校入学试验于理科方面过于缺略,似非所宜,经本会会员公同讨论,拟请通飭各省师范、中学等校今后入学试验一律加验理科”,得部令获准。⁷⁵1924年中博会曾对新学制初中自然课教材进行了两次讨论会。⁷⁶吴家煦也曾记述该会对于中小学校自然教育的活动及成绩,言“为促进学校注重博物学计,首主改订课程,由会呈请教育部增加中学博物教学钟点,另订实验观察时间于课外作业中,并于不佞主办之每岁暑期中小学理科教员讲习会,讲述博物学教授法,领导旅行采集,制作各种标本,指示实验观察,更藉中小学自然科学实验竞赛会,以鼓励师生实验,引发其兴趣,年举两次,周流全国”。⁷⁷

三、尾声

中博会大概在1929年年初便停止了活动,显著的标志是上年10月所发行的《博物学杂志》还在《申报》《时报》上进行广告推销。⁷⁸但自此之后,相关社团活动均不见报载。一个曾经活跃民国学界的社团,就此沉寂乃至消失,颇令人唏嘘不已。何以如此?笔者以为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彼时会中重要人物往往身兼数职,关注重点不在会务上。如会长袁希涛,正职是江苏省教育会会长,中博会会长实乃兼差。他又为一极关心民瘼之人,精力实无暇他顾。⁷⁹副会长吴家煦,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1913年至1927年,除博物学会组织外,他还任职于多个社团、教育机构以及政府机关,横跨教育界、科学界及政界。⁸⁰吴氏自承道,自己费心尽力,耗费钱财于科学教育事业,反被冠以“学阀”之称,结果“不只是丢开了三十年奔走提倡的科学,并且脱离了终身视为专业的教育,一变而投身财政界,所以从十六年起,到七七事变止,绝口不谈教育,也绝口不谈科学”。⁸¹后期总负责《博物学杂志》的会中重要人物吴元淦⁸²,其社会交游较之前两人逊色不少。这

⁷⁴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664页、703页。

⁷⁵ 《入学试验加试理科之厅令》,载《申报》,1922年8月7日,第13版。

⁷⁶ 《理科教授会年会纪》,载《申报》,1923年8月25日,第14版;《自然科教材讨论会明日开会》,载《申报》,1924年4月5日,第14版。

⁷⁷ 吴家煦:《中国博物学变迁史》。

⁷⁸ 《中华博物学会编辑博物学杂志第二卷第四期》,载《申报》1929年1月25日,第1版;《时报》,1929年1月26日,第1版。

⁷⁹ 黄炎培、汪懋祖、沈恩孚:《袁观澜先生事略》,载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766-767页。

⁸⁰ 计有:江苏省教育会干事,理科教授研究会(后改名理科教授会)总干事,寰球中国学生会干事、总干事,寰球中国学生会日校校长,江苏省视学(1920-1927年),财政部会计司一等科员(1927年10月任命)。还曾发起组织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参加闸北地方自治协进会等社会活动。

⁸¹ 吴家煦:《挽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科学教育》(上)。

⁸² 原任职镇江省立第六中学校,后任教于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8年该校改名为江苏省立苏州中

或许可从该杂志的封面题名中一窥端倪。笔者注意到，题写杂志名“博物学杂志”字样的，第1卷第1期至第4期及第2卷第1期落款分别为栩缘、心磬、清道人、孟乐和黄炎培⁸³，均为一时著名人物。而后三期则再无题名者。而且这后三期中，或许因稿件缺乏，已不再区分诸如先前“论说”、“研究”、“译述”等栏目。至于学会后期重要人物副会长钱崇澍，工作重心在高校教研及研究机构上，且“跳槽”频仍，大概无力分身从事学会活动，有限的贡献，是在《博物学杂志》（第二卷第二、三期，1927年）上发表了些许文章。令人奇怪的是，后来公开记载钱崇澍的个人履历的文字中，从不曾有提及他曾有过中博会副会长的身份。

二是中博会的成员多与其他学会会员身份交叉。例如吴元淦、吴家煦、秉志、胡经甫、邹秉文、费鸿年、张珽、钱崇澍、薛德焄、钟心煊、祁天锡等中博会会员，又为中国科学社“生物科学组”之“生物股”下社员。⁸⁴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20年代起，以动物学家秉志创建中国大学中第一个生物学系（东南大学，1921年成立）、以及第一个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南京，1922年成立）为开端，由博物学中分离出的以生物学之名而陆续成立的教研系所，改变了原先中博会以博物学之名进行的活动版图。1925年9月由中外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所组织的北京博物学会，在成立之初，也感受到某种压力，称其时“中国科学团体已有一地质学会成绩甚佳，又有科学社本年方在京举行年会，又有人种学及解剖学会，采矿及冶金协会，皆在北京。此外学术机关如地质调查所，北大、燕大、师大之生物学系，及地质学系，以及协和医学校之各种专门试验所，此皆与博物学具有密切关系者。现则复有第三次亚洲调查团在京新设之古脊椎动物研究所，以及金叔初君所设之北京生物研究所及北戴河沿海生物研究所。……本会之设对于以上各学术团体之工作并不欲有所重复或侵犯；但欲使以上各团体之会员及其他热心者彼此有合作之机会以互相鼓励，互相切磋，而共同进步”。⁸⁵北京博物学会的成立，无形中也加剧了这一局面。像钟观光、祁天

学）。

⁸³ 栩缘即王同愈（1856—1941年），字文若，号胜之，又号栩缘，江苏吴县人。进士，曾官至江西提学使。近代著名学者、藏书家、书画家、文博鉴赏家。

心磬即沈恩孚（1864—1944），字信卿，亦署心磬，初号摹梧，又号渐庵，晚号若婴，江苏吴县人。中国近代教育家，民国初年有名的社会贤达，诗文书史俱精。

清道人即李瑞清（1867—1920年），字仲麟，号梅庵、梅痴、阿梅。喜食蟹，戏号李百蟹。江西省临川县（今属进贤县）人。曾任江宁布政使、学部侍郎，入民国署清道人，以清朝遗老自居，不为民国任职。近代教育家、美术家、书法家。

孟乐即恽毓嘉（1857—1919年），字孟乐，号杞翁，又号苏斋。江苏阳湖人，生于顺天大兴。1892年中进士，曾任福建延平府知府。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卖文鬻书。

黄炎培（1878—1965年），字任之，号楚南，江苏川沙县人（今上海浦东新区）。中国教育家、实业家、政治家，中国民主同盟、中华职业教育社主要发起人之一。

⁸⁴ 中国科学社编：《中国科学社社员分股名录》，中国科学社印行，1933年，第31—37页。

⁸⁵ 《北京博物学会成立》，载《科学》，1925年12月第10卷第12期。该会成立初有会员35人，重要人物有魏尔特（Wildert）、翁文灏、金叔初、祁天锡、葛利普（A.W. Grabau）、李顺卿、谭熙鸿、钟观光、布拉克（Black）、林可胜等人。

锡等人,也是该会成员之一。中博会的学会凝聚力,在很大程度上因交叉现象的存在,而被稀释了。

第三则是经费和房屋问题。中博会的经费,维持一般的会务运转应无困难,但它始终不能获得大笔资助。吴家煦曾不无羡慕地说,同时期的中国科学社获得了庚子赔款委员会(即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捐款,⁸⁶大约可见中博会经费的端倪。至于房屋问题,在合并之前的博研会,就存在这样的困难。⁸⁷而前述合并之后的中博会,于1924年曾将标本转存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教育陈列所中,也可看出该会基础建筑的缺乏。

不过,尽管如此,在笔者看来,在约15年的时间里,⁸⁸中华博物学会至少在如下方面作出了成绩。其一,提高了包括动植物知识在内的博物学科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该会指出博物学的一大功能即是“区其种类,究其习性,俾各呈其才能,以为人世之效用”,并将博物学知识与“促进科学”、“发达实业”相勾连,⁸⁹接续了清末时人所倡导的该学科价值的工作,即包含有动植物学知识的博物学科也是国家富强不可或缺的知识资源。该会在多地设立支部及发展会员工作的成效,也是其社会影响力的一大表现。而且,中华博物学会的“示范”作用,相当明显。同期武昌高师博物学会在回顾该会之历史时,曾说道,“挽近以来,袁观澜先生等知博物之足尚,始有中华博物学会之组织,以为全国公同研究之机关。于是而北高、而成高,⁹⁰接踵而组织博物学会,曾发行博物杂志矣”。⁹¹上世纪三十年代丁致聘编写的《中国近七十年教育记事》一书,专门撷取中华博物学会成立的记载,或许也从侧面印证了该学会的社会影响。⁹²

其二,推动了近代动植物学知识的交流和普及。该学会凝聚了一批具有共同知识背景、共同价值观念的成员,提供他们知识成果发表和交流的平台——《博物学杂志》,并在此杂志上解答读者的疑问;又举办博物展览会,参与中小学含有动植物学知识的自然科课程、教材的审议工作等。

其三,促进了近代生物学科的建立与发展。该会一方面倡导学习近代博物学知识,从事动植物

⁸⁶ 吴家煦:《挽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科学教育》(中)。

⁸⁷ 吴家煦曾言,“可惜为了房屋问题,没有解决,有的主张募捐建筑,有的主张请政府拨给官产房屋,有的为着急于成立起见,主张先行租屋开办,筑室道谋,反而结果未能成功,很是一个遗憾”(参见氏著:《挽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科学教育》(中)。又,1916年,吴家煦曾呈请政府划拨苏州植园余屋及空地,作为博研会吴县支部场所之用,江苏省公署觉可行,训令苏常道尹“酌复核夺”,但此事后来似乎不了了之。参见《批:江苏省公署批第二百八十八号(原具呈人中华博物研究会吴家煦呈为吴县支部呈请拨用该县凤池庵旧屋及毗连园地会为会所场圃)》,载《江苏省公报》,1916年第1015期;《训令:训令苏常道尹(据省立第二中学等校会呈请拨植园旧址筹备公共学校园中华博物研究会呈请拨植园余屋空地以维公益由)十一月一日》,载《江苏教育行政月报》,1916年第11期。

⁸⁸ 笔者从该会的前身中华博物研究会发起的时间(1913年)算起,至1928年为止。

⁸⁹ 《中华博物研究会宣言》,载《博物学杂志》,1914年10月第1卷第1期。

⁹⁰ “北高”系指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高”系指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笔者注。

⁹¹ 《本学会之略史》,载《博物学会杂志》(武昌),1924年1月第5卷第3期。

⁹² 丁致聘编;李怡燕、郑鹤声校阅:《中国近七十年教育记事》,国立编译馆出版,1935年,第83页。

标本采集工作，撰写调查报告；另一方面将原先不被人重视的古代动植物学书籍挖掘出来，进行古今、中西、传统与近代学术沟通的努力，这是值得肯定的面相。⁹³另外中华博物学会从事的植物名词审定工作，对于确定一门学科的术语词汇也有一定贡献。

最后，中华博物学会中一些会员的构思、想法和提案，尽管并未能实现，但对于后来从事近代生物学教研工作的人来说，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例如“调查全国物产”、“筹办动物园、植物园及博物标本陈列馆”，组织临海生物研究所等，这些在后来 20 世纪 30 年代得到部分实现。

A Study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Natural Science Association of China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ANG Congguo

(Compilation & Research Center of the Qing History under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Beijing 100080, China)

Abstract The Natural Science Association of China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d two predecessors: the Chinese Research Society of Natural Science in Shanghai and the Survey Society of Natural History in Peking. This article uses the period before and after the merger of the two societies as a time boundary to roughly outline the overall activities of the Natural Science Association of China; and based on this, it discusses some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of the association and reveals the reasons for its rise and fall.

Keywords Natural Science Association of China, Chinese Research Society of Natural Science, Survey Society of Natural History, *Journal of Natural Science*

⁹³ 参见拙撰《重识鸟兽草木——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生根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2015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168-172 页。

